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四)

闯入“活”的历史 建构“像”的战争

傅逸尘

对波澜壮阔、雄浑悲壮的抗战题材来说,一味地解构和戏仿无异于隔靴搔痒、管中窥豹。对历史经验的具象书写以及对战争进程的正面描摹,应该是判断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价值意义的重要标准。

战争生命体验的缺失以及战争历史的时代距离都使得当下作家难以客观、准确地书写抗战历史的真实图景。于是,颠覆、戏仿、传奇便成了一种讨巧的叙事策略。当下的抗战叙事需要的不是传奇故事而是正史讲述,不是颠覆戏仿而是正面强攻,需要作家们雄浑地闯入“活”的历史,勇敢地建构“像”的战争。

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因为承载着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民族创伤和难以磨灭的民族记忆而历久不衰,亦是当代文学的焦点和重镇。在中国读者与观众的记忆中,抗战题材小说与电影最早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一大批长篇小说及根据那批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都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大家都熟知的如《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战斗的青春》《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破晓记》等等,将战争置于正义与非正义二元对立观念之中虽略嫌简单化,但因作者多数是其所描述的战斗生活的亲历者,因而对抗日军民艰苦卓绝斗争业绩进行了真实呈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保留了极富认知意义的文学性历史,同时也用另一种形式诠释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强烈的传奇色彩和民间话语表达使得这些作品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彰显了昂扬向上的审美基调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正在进行新中国建设的人们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与艺术感染。

新时期以降,“新历史主义”逐渐为抗日战争亲历者的后辈作家们所吸纳,其叙事主旨并不是对战争本身及“红色经典”进行颠覆与改写,而是为了表现和探寻被宏大叙事所遮蔽了的历史缝

隙与存在境遇,发掘个体生命在战争中面临的考验与存在的意义,并经由由此凸显战争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空间的丰富性。作家们对抗战历史的理解与观照渐趋多元,追求作品意蕴内涵的多重性和多向性,有效拓展了抗战文学的思考和想象空间,确立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新视角,实验了多样性的修辞和叙事技巧,探索了战争的荒诞本质及人性的丰富内涵,为抗战叙事实现题材的超越,由有限的战争走向无限的文学探索了新的道路。

进入21世纪,作家们纷纷寻求对传统政治话语和历史观念的突破,试图从个性化的视角切入抗日战争,建构祛除政治之“魅”的历史“真实”。宏大叙事和史诗精神,不再作为一种深刻而必然的金科玉律规约着作家们的思考和写作,一种区别于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历史记录的民间视角与个体记忆逐渐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另一种炙手可热的写作模式。在处理抗战题材时,作家们往往习惯于解构和戏仿,以绕开复杂的历史存在和混沌的战争现场,虚妄的历史、传奇的故事、脸谱化的人物、类型化的叙事甚嚣尘上;远离了沉实与丰饶,不见了宏阔与壮丽,甚至连抗战历史本身诡谲与奇崛的面貌亦变得含混暧昧,抗战历史作为一种公共的题材资源被快速且过度地“消费”掉了。然而,对波澜壮阔、雄浑悲壮的抗战题材来说,一味地解构和戏仿无异于隔靴搔痒、管中窥豹。在我看来,无论创作主体的思想如何深刻、视角多么新鲜、价值判断怎样个性多元,对历史经验的具象书写以及对战争进程的正面描摹,都应该成为判断一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价值意义的最为重要的标准。

如果仅仅将抗日战争视为背景或者容器,随意布置或装填那些无需证明亦无从证伪的传奇故事,就很容易把历史写死掉。在何顿的眼中,历史是一种精神、一种情绪甚至是一种流动的生活状态。他在《黄埔四期》中描写的主要人物谢乃常、贺百丁等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在波澜壮阔的战争和历史风云中,都曾有着荣光时刻;所书写的诸如淞沪抗战、忻口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赵锦斌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等也都是有案可查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何顿的笔触并没有局限于为逝去的历史勾勒骨架,他还要为历史保存更多“活着”的信息。《黄埔四期》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文革”之后,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对照书写,前段重点写抗日战争中官兵的奋战,后段写这些老兵在1949年之后的各色人生。诚然,战争背景下英雄人物的传奇经历的确更容易吸引读者的关注,但是对于真正的历史而言,传奇是变量,普通平凡才是常态。战争和历史进程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与普通生命情态是更为复杂也更为幽微的“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贺百丁和谢乃常以及他们的战友和士兵们,和寻常的

百姓一样经历了社会的变迁和命运的起伏。在生活的流态中,何顿着力书写摇曳多姿的人情之美,在命运的乖谬中勉力张扬元气勃勃的生命活力,在历史的吊诡中极尽礼赞慰藉心灵、拨擢灵魂的爱,使得作品在更深层次上通达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体验,进而拉近了文学的丰饶与宏阔。在《黄埔四期》中,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是孤立的,上至统帅、将军,下到士兵、小民,他们经历的并非单纯的战争,亦非浪漫的传奇,而是在命运的无常与生命的流逝中长久持续、反复纠缠的无奈与痛苦、伤害与慰藉、理解和妥协、隐忍和决绝。历史的构成离不开这些琐细、坚韧的细节,而对抗战历史的接续和显形正是在这些鲜活的生命细节中达成的。

小说所保存的是日常生活中枝枝蔓蔓的部分,是有生命力的。如果没有这些枝枝蔓蔓,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骨架,小说家看似虚构的笔触,可以为历史补充许多真切实在的细节和肌理。在《向延安》中,海飞的叙事重心牢牢锁定了抗战背景下人的生活或者说生活中的人。日常经验围绕着人物铺展开来,小到言谈、穿着、举止、饮食,大到心理、性格、精神、命运,海飞小说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在战斗,更是在生活。即便战争袭来,改变的是人物命运的走向,不变的是生活本身恒常的逻辑。在兵荒马乱、随时都会有性命之虞的战争境遇中,同学们想的是怎样追寻和实现革命理想,而向金喜源偏迷恋的是做菜。向金喜源源不断从那个蒸腾着烟火气和温润



感的灶台间中端将出来的,不是他宛如魔术师天赋异禀的人生传奇,而是那即便已成孤岛也不曾被战争打断须臾的寻常日脚。海飞对抗战背景下日常经验的重视和对鲜活历史信息的发现,之于历史、之于文学、之于生命,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21世纪初年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在突破旧有文学观念的束缚和借鉴西方现代小说方法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致命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战争进程的描写都不够充分。徐贵祥的不同之处,是他笔下的抗战显得很“专业”、很有“生活”,看起来很“像”抗战。这个“像”字虽然不是评判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但对于当下的抗战叙事恰恰是最为稀缺的。他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既有对整个战役的宏观展示,又有对具体战斗场面的微观描写。徐贵祥细腻地刻画了战场形势的瞬间万变与战斗场面的悲壮惨烈。徐贵祥笔下的战争场面包含着非常巨大的信息量和细节量,其中涉及到战略战术、军事指挥、通信情报等一系列军事专业的知识,远远超出了一般作家靠查阅史料和主观想象所能达到的程度。长期的部队基层生活和“南线战争”的亲身经历使徐贵祥在面对战争场面描写时具备了其他作家无可比拟的优势,由此他才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逼真地再现抗日战争的战场环境和战斗进程。

小说所要呈现和探索的是生活中感性而隐秘的“内在经验”,是生命舒展的痕迹。而生命的痕迹,往往被笼罩在历史这一巨大的幕布之下,小说就是要将原本隐匿的生命痕迹从历史和生活的各个角落、各种细节里发掘出来,从而让生命构成一部属于它自己的历史。同样是描写具象的战争,徐晨达的《滴血的刺刀》更在意个体生命在战争进程中的肉身感受和精神体验。作者沉湎于对每一辆坦克、每一发炮弹、每一架机枪、每一发子弹的性能、过程和效果的描写之中,尽力触摸战争中最微小的瞬间和剧烈的伤痛,以求还原微观的战场环境,抵达酷烈的战壕真实。他

■ 编者的话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抗战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便成为了中国文学艺术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门类。几十年来,社会背景和思潮的变迁使得这一题材的作品在思想内涵、艺术形式等方面发生了丰富而微妙的变化。

傅逸尘在抗战题材文学作品的历史纵深中开始观察,发现了目前这一题材作品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抗战历史作为一种公共的题材资源被快速且过度地“消费”掉了。他在文中对何顿的《黄埔四期》、海飞的《向延安》、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徐晨达的《滴血的刺刀》展开了细读,认为这些作品很“专业”、很有“生活”。与此同时,作者也再次提出了作家把握历史真实的能力问题。

更会写到子弹爆头后“一股血雾从他后脑勺上喷溅开来”以及“脑袋上的军帽由于子弹的惯性而被击飞,整个脑袋好像熟透的西瓜一般炸裂开来,两股鲜血从额头和后脑勺几乎同时喷溅而出”;当日军坦克碾压过来时“吱呀作响的履带上犹自还印着中国士兵的血渍,碎肉伴随着鲜血滴滴答答地顺着履带的缝隙滴落”;在阻击战中“一个浑身着火的人,挣扎着,从火焰包裹之中的草丛中窜了出来,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好似受伤的野兽一般嘶吼着”,却绝不让出阵地。作者通过如手术刀般精准的笔触把人在战场中的具体处境、战争损伤和心理变化,清晰且鲜活地描绘出来。对战场环境和战斗细节纤毫毕露的呈现,是这部由网络连载而成书的“铁血小说”迥异于其他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的一大特色。徐晨达对各种型号武器性能、作战组织形式、微观战场环境的熟谙,使得每一段文字都具备了极强的节奏张力,甚至裹挟着战场的气味和色彩。

近年来,正面强攻抗战历史的写作伦理之所以新趋式微,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下的部分作家丧失了对历史真实的把握能力,既不具备对待大跨度历史的严谨而虔诚的态度,也不具备实地勘察的勇气和对历史资料反复论证的学术精神,就连最基本的写实能力都在退化。战争生命体验的缺失以及战争历史的时代距离都使得当下的作家们难以客观、准确地书写抗战历史的真实图景,而只能绕到战争和历史的背后去寻觅一条鲜为人知的小径。当无法全面、准确地把握抗战历史时,颠覆、戏仿、传奇便成了一种讨巧的叙事策略。诚然,“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虚构”本就是长篇小说的文体属性,但“虚构”的前提是创作素材与创作者的经验、想象构成一种逻辑关系的真实,从伦理的角度形成叙述的可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抗战叙事更加迫切需要的不是传奇故事而是正史讲述,不是颠覆戏仿而是正面强攻,需要作家们雄浑地闯入“活”的历史,勇敢地建构“像”的战争。



■ 新作快评 谢络绎中篇小说《倒立的条件》,《钟山》2015年第2期

来自陌生的信任

行超

谢络绎的小说风格鲜明,常常是在一系列绵密的细节描写和异常耐心的氛围渲染之后,倏忽抛出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谜团——《到歌马河那边去》《少年看到一朵牡丹》《无名者》等都是如此。她喜欢探究极端条件下的人性和人的处境,在这方面,中篇新作《倒立的条件》有着很强的代表意义。

《倒立的条件》中的极端情境是女子监狱。小说开始时,素来无人问津的女囚肖云彤迎来了一个陌生的访客,这个自称“武扬”的男人让她感到讶异,进而变得气急败坏——在她的记忆中,武扬已经确凿无疑地死了。小说的故事由此渐次展开:几年前,为了进北京的医院工作,肖云彤辗转拜托了高中时并不相熟的老同学武扬,进了医院之后,因为想换科室,再联系时才知道,武扬因公殉职了。百般无奈之下,肖云彤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副院长,也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肖云彤人生走向了“失控”——为了反抗副院长的强暴,肖云彤将一把尖刀插进了他的胸口。警察来时,因为对刚才的一幕羞于启齿,肖云彤只说他贪得无厌,想要更多的钱。无期徒刑和五万三千元的惩罚摆在了肖云彤的面前。在牢里,肖云彤面对着“人间所有的黑暗”,她一次次申诉,一次次被忽略。当她知道,申诉3次以上就是缓刑,会影响到包括行政奖励和刑事奖励的各种待遇,进而必须真的面对无期徒刑时,肖云彤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为自己申诉的“家属”,前夫华章当然是靠不住的,他在得知肖云彤获刑的第一刻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于是,她想到了武扬。此刻的肖云彤必须相信武扬的死而复生,相信他说自己为了工作而死,又为了工作再一次活过来,这信任几乎成了她生命的希望。

谢络绎是营造氛围的高手,常常三言两语就可以把读者带到一个陌生的情境。《倒立的条件》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所有的情节、所有的人物塑造都在监狱里发生,都围绕着肖云彤的日常和回忆而展开。薄情寡义的前夫、神秘而具有力量的武扬、那些不知是敌是友的狱友以及她们之间或明或暗的暧昧,都在谢络绎的笔下暗自生长着。小说自始至终都弥漫着一种压抑、诡谲的氛围,让人屏息凝神,肖云彤们那“比死更像死的活”、“烂透了”的活”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立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情况下,一个人才会完全信任一件看似几乎不可能的事?完全信任一个几乎陌生的人?《倒立的条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谢络绎小说意图探究的领域,《旧新堤》《少年看到一朵牡丹》中的父子、母子关系,《昏以期为》《丁字出头》《鸟道》中的夫妻关系等等,这些其他作品中被描述得温情脉脉的关系在谢络绎的笔下却总是显得有些残酷,这种残酷大多源自一种时间上、心理上的无法沟通和“错位”。换言之,也许谢络绎的小说从根本上说,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永远难以弥合的距离。

谢络绎此前做过心理医生,对于她曾经听到的那些人的故事而言,她的小说似乎还不够狠。她说自己有机会接触大量表面上看上去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人,因此才知道温情其实是很多人无数次失意与努力托举后的产物,它们并不大量产出,却又大量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这是不正常的。“还原现实中那部分真实存在又常常被人回避的正常的、不成功的连接状态”,这是谢络绎写作的目的,也是她小说的力量所在。

■ 短评

社会风情中的人性景观

——读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 □王春林

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可以看作是一部带有强烈成长意味的社会风情小说。就艺术结构而言,主人公林诗阳高中毕业后一直到他退居二线成为县人大主任的人生历程构成了整部作品的结构主线。这个过程中,林诗阳从一个初始涉世生活的懵懂少年发展蜕变成一位颇有社会政治经验的基层官员。因为小说叙事始终聚焦于林诗阳的人生历程,所以《垛上》自然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成长小说。

但一部成长小说为什么要被命名为“垛上”呢?所谓“垛上”,乃是林诗阳故乡荷城县一带水乡所特有的地貌状况:“村庄与村庄之间尽是一块块草垛一样的土地,像是漂浮在水上,原先叫坨,又叫坨,现在人们都叫它垛田,也叫垛子……这里的人也特别,叫垛上人。”在充分展示林诗阳成长过程的同时,刘春龙也把很多笔触放到了社会风情的描写上。一方面,小说中巧妙地穿插着种种大约只有“垛上”这样的奇特水乡独有的民情风俗,另一方面,也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近百个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境况。就此而言,《垛上》毫无疑问可以被视为一部社会风情小说。

刘春龙是里下河作家群的代表之一,里下河作家群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就是特别善于点染描写极具地方色彩的民情风俗,特别善于关注表现普通民众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这一点,在堪称他们“祖师爷”的汪曾祺那里就有极其鲜明的表现。这方面,刘春龙《垛上》的表现也同样十分抢眼。从乡间的鱼事农事到婚丧嫁娶、节庆时的民俗表演、湖神庙会所牵系出的民

间信仰,一直到那首曾经数次出现几乎可以被视为《垛上》主题歌的民歌《三十六垛上》,均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刘春龙并没有为地民情风俗而民情风俗,而是特别恰如其分地把这些民情风俗的展示水乳交融地穿插整合到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小说第36章“湖神会”中关于与湖神会相关的民间信仰以及民俗表演的描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事关“湖神会”的情节发展过程中,作家非常巧妙地把与“湖神会”紧密相关的各种民情风俗不动声色地进行了尽情的展示。因此,寓民俗风情描绘于生动的故事情节之中,可以看作是刘春龙《垛上》突出的思想艺术特色之一。

与民俗风情的充分展示相比较,更根本地决定着《垛上》思想艺术成色的,是作家对于人性世界的深度体察与透视。优秀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中的人性探索往往会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而集中体现出来。能否在一部体量相对庞大的长篇小说中塑造几位生龙活虎、活蹦乱跳、具有深度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正是衡量其思想艺术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刘春龙的《垛上》最不容忽视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深入勘探人性世界的基础上相对成功地塑造了若干位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首先当然是主人公林诗阳。作为一位结构性的人物形象,林诗阳的人生行迹贯穿着文本的始终。刘春龙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小说一方面充分凸显出了他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其人性构成中的自私与软弱。

此外,小说《垛上》也塑造了其他若干具有相当人性深度与美学价值的人物形象。比如备受苦难命运折磨的冯秀娟。她因为家庭成分而错失爱情,忍受着明明相恋而不能长相厮守,不得不与另外一个简直就是不相干的男人度过一生的命运。但命运对冯秀娟这个苦命女人的折磨却并没有到此为止,20年之后,高中毕业的儿子林诗阳面临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口,冯秀娟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再一次奉祭自身,饱受了来自村支书三倚子的不堪凌辱。冯秀娟的人性尊严前后两次遭受屈辱和折磨,所折射出的正是作者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入反思。

再比如敢于把握自己情感命运的繁漪式的女性金英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敢于冲破政治身份的藩篱,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这种举动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金英姬作为一位乡村现代女性的精神风貌。

冯秀娟、金英姬之外,其他诸如三倚子、沈涵、二先生、沈俊奇等,也都称得上是《垛上》中塑造得相对成功的人物形象。必须指出的是,在林诗阳、冯秀娟、金英姬等人物情感悲剧的描述展示过程中,潜藏着作家足够清醒深刻的现实当义批判立场。无论是冯秀娟与沈俊奇当年的情感悲剧,还是林诗阳与金英姬后来的情感悲剧,抑或冯秀娟的再度受辱,皆是那个畸形政治时代极不合理的社会机制作祟的缘故。从这个角度来说,清醒深刻的社会批判与反思也是《垛上》的思想艺术特点之一。